

17.05



98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京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毛主席关心革命老根据地人民·····徐炳耀	(1)
我们这支队伍是打不垮的·····王瑞华稿 王可达整理	(3)
回忆南山医院的艰苦岁月·····陈高耀	(25)
红三军少共模范团训练班·····张才良收集 郭圣杰整理	(30)
直港上的桥·····严正	(34)
深切怀念张执一同志·····郭础	(37)
悼张执一同志·····张任伟	(40)
洪山支队的组建和改造·····王可达	(42)
三杯通大道·····祝齐民	(61)
怒涛中的浪花·····张诚	(67)
缅怀先岳刘英烈士·····谢珣航	(82)
化育苏民的好道台	
——记清代官员曾德充治台业绩·····张学玉 吴本忠	(85)
老中医戴勤帮·····曾令熹	(88)
民间艺人项么·····张学寿	(91)
北山人民的幸福和苦难·····咏石	(95)
过去的永隆河·····严作勋稿 张绍新整理	(102)
“抗日”，“扫荡”·····张显华稿 何况整理	(108)
张文秋与京山城关第一所女子小学·····教育志办公室	(118)
京山女学三变三迁·····查春生 查一群 张善铨	(122)

官教勾结，迫害学生

——京山县中所谓“共党有组织破坏复员”的

事实真相……………彭家凤(126)

痛打熊廉泉

——永隆中心国民小学一次学潮……………徐翔(133)

反革命刽子手杨之茂……………张庚(135)

我所知道摩旗观土匪的点滴…项么口述 张学骞整理(138)

土匪逞乱世，南乡多灾难……………

……曾仲超口述 徐帮杰整理 何况补充校正(142)

“板”琴……………聂绍弩(152)

京山地区旧时的婚礼……………张明耻(160)

宋河解放前后的文娱活动点滴……………文初(164)

五毒、四凶、两魔，八鬼和九老

——记宋河过去叔绅的由来和趣事……………文初(168)

京山是云杜古战场……………李飞熊(170)

洧水之名的考证……………李飞熊(174)

有关芭蕉寺历史探证……………张诚(178)

太阳长庆禅寺遗址访古……………秦守华(184)

民国时期京山县主要官员……………张学玉(187)

毛主席关心革命老根据地人民

徐炳耀

全国解放后，毛主席时刻关心革命老根据地人民。一九五一年，毛主席派张文秋大姐（毛主席的亲家）率领中央慰问团一行约十二人来到京山。他们分别深入到丁家冲、八字门、向家畈、石板河、向家冲等地访问了烈属、军属和拥护共产党参加抗日反蒋的爱国人士。我那时十七岁，我和母亲受到了慰问团的亲切关怀和慰问。母亲引我们弟兄三人，只有我一人参加了地方工作，二弟和三弟因家庭困难，上不起学，每年只念二个月的冬书。慰问团张大姐当时把我两个弟弟带到京山县政府住、吃，发给他们的衣服，到京山城关念书，使他们得到了政府的直接关怀和照顾，同时，还照顾我们家800斤大米，又安排地方政府每月照顾我母亲60斤大米。象我们这样困难的烈属子女，就我知道的就有五人带到京山安排念书。慰问团每到一个地方，除了对烈军属慰问外，还走访群众，召开座谈会、群众大会宣讲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表彰英勇抗敌的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和爱国人士。我岳父陈光明（抗日时期任源泉联乡办事处主任，共产党员、区委委员、支部书记）五师突围掉队，被国民党捉去打成终身残废，慰问团的同志动员他的四个姑娘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据我知道当时还动员了一大批军属的子女，一些老同志和他们的子女参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运动。慰问团访问结束后，召开了全县烈属和抗日时期支援前线的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选举了我和彭友德同志一同赴北京参加十月一日国

庆观礼，我们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人民代表团的成员于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集中到武汉中南军区。二十八日到达了北京，住北京师范大学，二十九日朱德、周恩来、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十七位首长到师范大学住处，对代表们进行了慰问。同时毛主席下书于九月三十日下午七时在怀仁堂举行盛大招待宴会。十月一日上午，毛主席和全体中央委员同代表们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代表们在经过主席台时，又一次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一一握手。晚上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看了焰火，十月二日晚上七时，代表们在怀仁堂观看梅兰芳的京剧。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贺龙、彭德怀、叶剑英等十七位首长又一次接见了代表们。

代表们在北京受到了党政军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要我们宣讲了革命根据地人民斗争史，还用中央专用列车送我们代表到南京、天津、上海等各大城市宣传革命根据地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荣事迹。代表们每到个城市都受到党政领导的亲切接见和盛大的欢迎。

我们在两个多月的活动中享受了崇高的政治荣誉和十分热情的招待，使我们终身难忘。毛主席和党中央关心革命老根据地人民，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我们一定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奋斗。

我们这支队伍是打不垮的

王瑞华

编者按：

一九四〇年秋，我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粉碎了日寇对京山北部地区的一次“扫荡”后，当时的纵队司令员李先念同志在总结这次战斗时有一段讲话：

“我们这支队伍是打不垮的！请看，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带领一支几十名赤手空拳的医卫后勤人员，在这次反“扫荡”中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周旋了半个多月，现在又一个不少地回来了。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这个真理：我们的新四军是不可战胜的！”

李先念同志在这次讲话中所说的“大姑娘”，就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档案处前处长王瑞华同志。一九八三年四月，我们专程走访了王大姐，请她把自己青年时代在京山的这段战斗经历作了一番回忆。大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为我们讲述了她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哺育下，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的过程。

以下，是王大姐这次回忆的记录。

京山是我的“老家”

回想我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半壁河山沦入敌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光复国土，驱除倭寇，解放我们的民族，我跟着党来到京山，和京山的群众一起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在失败的痛苦与胜利的

欢乐中，与京山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骨肉情谊，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可珍惜的一段。所以我常说京山是我的老家，其实我原籍是应城。多少年来，我一直都想把这段生活记录下来，用以表达我对京山父老兄弟、姐妹的感激和怀念。可是，总由于工作忙，就把它拖了下来。今天有机会和同志们一起畅述以往，回忆这段生活，并通过你们转达我对京山父老的问候，也算了却了我一桩心愿。

一、上山打游击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信阳、应山、安陆、咸宁、黄冈相继失守，武汉岌岌可危，鄂中形势也突然紧张起来。那时，我刚从汤池训练班回到应城家里，只见国民党军队从武汉溃逃出来，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铺天盖地，象潮水般地沿汉宜公路及其两侧，经过应城，向西流去。难民们神色凄惶，形容疲惫，携老扶幼，肩挑背负，夹杂其间。公路上，到处都是溃军和难民们丢弃的枪支弹药，箱笼行李，挺好的马也没人要，在公路两侧左冲右突，狂奔乱跑。当地人更感到国破家亡，惶惶不可终日。不少人也汇入人流，向西涌去。

十月二十一日，六架日寇飞机对应城进行轮番轰炸，向人群俯冲扫射。整个应城都笼罩在浓烟、烈火中，城里城外，到处都是倒在血泊里的尸体和呼号中的受伤群众。幸存者们丧魂落魄，纷纷向乡下逃跑。至于那些平时高喊“守土有责”、“与应城共存亡”的官员们，早就有轿坐轿，有马骑马，在士兵们的簇拥下逃跑了。

那时，我才十七岁，从汤池训练班回家后，本打算休息几天再去学校的，哪知几天之内，风云突变，回汤池已不可能

了。早在训练班时，陶先生（当时对陶铸同志的尊称）就教导我们作长期抗战的准备，打算在武汉沦陷后上山打游击。现在是需要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便和哥哥王学成，侄女闵宝芳、闵宝兰一起，带上一点简单的行李去找汪心一同志。

汪心一，共产党员，大学生，抗战发生后，他根据特委指示，在李家集，陈家河一带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准备武汉沦陷后在鄂中开展游击战争。此刻，他正在李家集，利用汉流关系，联络了一批人，公开收拣枪支，组织武装，并且已经打开了一个局面。我们一行四人首先到临江口，又从临江口转到李家集，找到了汪心一，要求他派人送我们上山找陶先生。可他那时正在训练军队，筹集军款，忙得不亦乐乎。没时间安排人送我们，便叫我们先在陈家河住下，等有了机会再走。这样，我们就到了陈家河，等候上山。

这时候，我们汤池训练班和汤池临校的同学胡旋同、高菲、林克她们三人也在陈家河。她们毕业后都安排在陈家河教小学，准备应城沦陷后打游击去。现在，学校垮了，她们也来找汪心一，汪心一便叫我们和她们一起在陈家河等待上山。

我们会合后一共七人，成天找汪心一吵，要他送我们上山，但汪心一总是向我们解释，说：“现在溃兵很多，路上极不安全，特别你们女同志，弄不好出了麻烦，我交不了帐。”

后来，我们闹得凶了，他又说：“要走可以，但有个条件，那就是你们把头发都剃光，化装成男孩子走。行吗？”

对于这个条件，胡旋同坚决反对，我也不大想剃，所以终未达成协议。就这样，我们七人天天吵着走，天天走不成，

心急火燎地在陈家河等了好几天。后来，机会终于来了。

原来我们在陈家河这期间，应城沦陷了。国民党应城县常备大队长李又唐派一个连去大洪山找他们的上级领饷，汪心一托他们把我们带到了家冲，他们答应了。

好容易盼到上山了，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为了路上安全，我们几个女同志，从老百姓那里买来些老年妇女的服饰，化起装来。几个二十岁左右的大姑娘，尽管穿上了毛兰大褂，扎上了清水包头，象演戏化装一样地胡折腾了老半天，但总还是不象老太婆成了个四不象。

我们一行七人和李又唐那个连一起，离开李家集，奔向丁家冲，开始了我第一次行军生活。临行，汪心一给了我们两条“老汉造”枪，我和高菲各背一条。

李又唐是国民党的军队，那时虽是国共合作时期，但究竟不是自己人。我们几个大姑娘跟着他们走，心里老不踏实，时刻准备应付突然事件。

我们担惊受骇地走了一天，到了田店。在田店，我有个同学叫李家珍，我找到他，他把我们几个人安排在他老丈人家休息。李又唐的那个连队则住在同村的另一些群众家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解除警戒，夜间我们商量好轮流守夜，防止意外。当地老百姓见我们这模样，也为我们担忧说：

“这几天牛也叫，猪也叫，怕是要出事了。”示意我们要警惕。

我整整一宿都没睡好，好容易挨到天明，幸好没事，我们草草吃了点东西，又出发了。这一天，我们经过石

板河，下午到达了丁家冲。

到了丁家冲，李又唐的军队继续北去，我们七人就进村找黄定陆。人家说，黄定陆在赵家祠堂，我们又往赵家祠堂跑。还未进村，老远就看到了沈少华，我们不禁欢呼起来。才几天不见，就象久别重逢一样，大家都十分高兴。我问他陶先生，他说陶先生还未来。说着说着，走进了祠堂。在祠堂里，首先看到的是我们汤池训练班讲游击战术的教师杜石公。杨学诚、李蔺田、项浩风他们好多人都在。一会儿，黄定陆也回来了。

傍晚，开饭了，可是连吃饭的碗都没有。怎么办？只好去向老百姓借，老百姓家里，一户也就那么三、四个碗。我们几个人，一人一个碗就借了半个村子，吃完饭还得马上还给人家。（一连几天就是这样借的，过了几天，来了一个剃水瓢的师傅，我们请他给我们每人剃了一个小木碗，每个五分钱。这下可就解决问题了，这个小木碗，虽然松香味很浓，难闻，但拿根细绳一系，拴在腰间，不但可当饭碗，还可用来喝水，漱口，洗脸也凑合，很方便。这当然就是后话了。）这天，饭虽很简单，但大家都吃得很香。天黑了，要睡觉了，杜石公住祠堂大厅东部，我们几个女同志住西部。杨学诚、李蔺田、项浩风、黄定陆他们住祠堂后民房。我们七手八脚，散开几捆稻草，打开行李往上面一铺，倒头便睡。在陈家河好几天没睡好。接着两天行军，头一夜在田店又极紧张，今天总算回到了家里。这一觉睡得特别香甜。

二、军医生活开始了

第二天清晨（大约是十月二十八日），我们驻地后山

上“嘎”地一枪，把我们从梦中惊醒了。这是我在战争中听到的第一声枪响，有些紧张，赶快起床。这时，大家都来了，集合在祠堂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杨学诚问，谁到后面山上去看看，大家你看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吱声。没法，他只好把枪一背，到赵家祠堂后面，赵家咀上站岗去了。站了一整天，天黑才回来。这就是当时流传在五师的抗战故事：《特委书记站岗》。

这天中午，几个老百姓用门板抬来一个伤员，伤势十分严重，一打听，才知道受伤的是徐休祥同志。这时，他早已神志昏迷，生命十分危险，必须赶快抢救，可是这里一无药物，二无设备，怎么办？大家都很着急。项浩风冲着我们几个女同志喊，要我们组织急救。我虽然武汉沦陷前在《女职》学过一点医学常识，还唱过《慰劳伤兵歌》，但此时真地见到伤兵员，又害怕了，其他几个女同志也都往后缩。项浩风这么讲了，大家还是不动手。高菲见此情景，把我往前一推，说：

“你学过医，就赶快动手吧！”

我只好鼓起勇气，动手治疗。我走近伤员，把蒙在他面上的布揭开，一看，血肉模糊，十分可怕。再一摸，还有点气，就叫大家帮助我，赶快进行急救。可手头什么也没有，只有项浩风带的一点纱布、药棉、红汞、碘酒之类的东西。于是，我找了一只饭碗，一双筷子，把它们放进烧饭的锅里一煮，就算消了毒。然后左手端碗盐开水，右手拿双筷子夹着药棉给伤员洗伤。洗净后，贴上纱布，用绷带一扎，就算作了急救处理了。

原来，徐休祥同志他们一行七人，接受特委指示，前一天从炉子坡出发，准备去湖区找许子威同志，行至王家松林，碰

上了一伙国民党溃军，把他们七个人吊在树林，朝他们打了一阵乱枪，扬长而去。结果，他们七人中跑了一人，当场打死三人，重伤三人。徐休祥同志重伤后忍着剧痛，跑到小冲就倒下来不省人事了，小冲的同志发现了他才把他送到这里。今天早晨，在我们后面的山上放枪的也是这伙乱军。

这就是当年“应抗”有名的“王家松林事件”。

三、在“应抗”宣传队

过了几天，陶先生来了，蔡松云带着他的八条枪也来了，四面八方的人都集中到了丁家冲。特委把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青年男女同志编为“应抗”宣传队，和特委一起活动。我们这个宣传队人虽不多，但班底很硬，杜薇会跳舞，胡旋同会演戏，谭扶平的男中音上过广播电台，高菲画得一手好画，陈一震、苏伟等都是多才多艺的人，活动起来，还是七个有水平的宣传队伍。

刚开始，宣传队和部队一起生活。过了几天，人家不干了，说“我们不侍候这些少爷小姐们”，不给打饭。不干就不干，我们自己动手！于是，宣传队就自己起伙了。我和林克最小，当采买，每天上街买菜。那时，两毛钱一斗米，菜也便宜。买回米，再向部队领点油盐，做起饭来。开始，我们不会做饭。杜石公告诉我们说：“烧饭也有个‘三阶段’：大火烧，鼓大泡；小火烧，水干了；余火焖，饭烧好。”

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学会了做饭。

过了几天，我们宣传队改为宣传科，潘琪当科长，他给我们讲发动群众，全民抗战的道理。还带我们下乡宣传，每天早饭一吃，我们便三三两两地往附近的村子里跑，去宣传抗战，发动群众。

四、在“鄂中妇女抗日服务队”

没多久，特委成立了一个“鄂中妇女抗日服务队”，夏菲当队长。我们宣传科全部调进服务队，离开丁家冲，到了向家冲。这时，京山县委已经成立。顾大椿同志当书记，住张家祠堂，我们服务队也住张家祠堂。

在这里，我们的物质生活仍很艰苦。有一次，胡旋同害伤寒，病得很厉害，既无营养又无药，人拖得不成样子了。同志们很着急，为给她营养身体，汪心一跑到溪沟里去摸了些乌龟回来，高兴地说：“这可是最好的营养。”

在向家冲期间，我入了党。入党后，一个同志热情地给我拟定了一个学习计划，开了一个读书目录，好多书：《铁流》、《静静的顿河》、《论政党》……，我很认真地把这些书目贴在墙上、以便按计划读书，可是，有个好心的同志，看了又说，我不该把这样的东西贴在墙上，让人家看到了说我们是共产党。

冬天，骆经秋带着老婆、孩子、丈母娘一大家人到了向家冲，当了留守主任。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成立，李范一先生任政治指导部主任，陶铸同志为顾问。一九三九年初，政治指导部转移，住长岗店。钱大姐（钱英）带领特委机关和我们服务队到了长岗店。在这里，指导部给我们服务队每人发了一个臂章，每月每人还有十五元薪水，只是这十五元钱不发给个人，要集中使用。因当时我们部队未经国民党承认，没有军饷，特委只好把指导部的同志们的薪水集中使用，解决部队给养问题。

一九三九年春节，国民党湖北省第三行政区专员石毓灵

视察政治指导部，到长岗店一看，到处都是“抗战到底”这样的标语，潘琪还编了一出“门儿开开，请请进来”的戏，讽刺国民党消极抗战。这一下，把石毓灵气昏了，回去就下令把政治指导部给撤销了。

五、在“应抗”后方医院

一九三九年三月，政治指导部被撤销后，原在政治指导部工作的同志，有的去了731团，有的到了“应抗”。我被调到“应抗”后方医院，从长岗店到了赵泉河。

原来，应城沦陷时，陶先生通过汪心一他们，把应城医院五十多挑，一百多箱医药弄到了向家冲，在张家祠堂成立了这个“应抗”后方医院。一九三九年三月“扫荡”后，医院又从向家冲搬到了赵泉河。我从长岗店到赵泉河，看到这么多医药，且都是德国拜耳厂的产品，高兴得不得了。

这时，医院院长是栗秀贞，易齐萍当护士长，我担任了指导员。在医院里，开始基本没有医疗任务，又无敌情，工作轻松愉快，我们这些年轻同志，总在那里唱歌，白天唱，黑夜唱，连走路也在唱。

有一次，陶先生和孙耀华同志来医院，我们都很高兴，院部决定开一个晚会欢迎他们。听说开晚会，同志们马上行动起来，每人到山上砍回一捆柴。傍晚，在医院门前空场上烧起一堆篝火，把整个赵泉河都照得通红，大家围着篝火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其间，有人拉陶先生唱歌，他说：

“我不会唱歌，给大家来个故事吧！”

他讲的故事，语言生动流畅，情节引人入胜，不时引起同志们热烈掌声和哈哈大笑。他讲完了，同志们齐喊：

“再来一个！”

他也就再来一个。

陶先生讲完故事，接着就有人喊：

“孙县长，来一个！”

大家嚷着要孙耀华同志唱歌，孙耀华装出十分为难的样子说：

“同志们，行行好，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讲故事，来个跛子走路吧！”

说着说着，就在场上一瘸一瘸地绕了个“S”形弯，让大家笑出了眼泪。

不久，医院开始接待伤员，工作忙起来了。记得有个伤兵叫李平山，当过红军，住院期间表现很好，我介绍他入了党，伤好归队，不久，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一九三五年春，石毓灵撤了孙耀华应城县长的职，我们在石板河新成立了一个应城县政府，沈少华任代理县长。我们医院也从赵泉河迁到了八字门，住白果树湾。

六、在二十二集团军特工总队

一九三九年四月，郑绍文同志搞了个“二十二集团军特工总队”，在平林店招兵买马，拉起了一个摊子。为了利用这一合法地位扩大抗战武装，边区党委决定，派一批干部去充实特工队。于是，杨学诚同志带了我、张天瑜（张林，医院护士）、杜徽三人到了平林店。在特工队，他们让我当了医官，但是，我没有医病，主要是在接待新兵。这些新兵都是通过党组织动员来的一些青年农民，一般政治纯洁，身体健康，从而保证了部队的战斗力。

有一次，郑绍文同志请客，叫我这个“医官”作陪。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向张光兰借了一套她从枣阳穿来的灰布

军装，去参加宴会。一进门，我行了一个军礼，郑绍文大笑起来，说：“军人在室内行举手礼，这是第一次见到。”

出了我的洋象，弄得我十分尴尬。

不久，日寇发动春季大“扫荡”，我们移防到了赵泉河。

在特工队医院里，开始，国民党给了我们一挑子中药，我虽当了医官，但不懂中药。郑绍文同志见到，拿起一样药告诉我说：

“这是黄连，吃少了健胃，吃多了泻肚子。”

这样，我便学会了这味药的用法。到了后来，国民党停止对我们的供应，生活越来越困难，有的同志吃不来包谷，犯胃病，还得亏了这味药。

国民党停止了对特工队的供应后，我们穿衣都发生了困难。我和大洪（洪静）两个人三条裤子，轮流换洗，还勉强凑合，其他的人，只一人一条裤子，换衣时，只好蹲在赵泉河那泉水河里，等衣服干了再起来换上。冬天，王国英成立了一个合作社，给郑绍文同志做了一套衣服，裤子半长不短，穿上难看极了，可郑绍文同志就穿上这套衣服到处摆，让战士们看。这就加强了同志们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工作又繁重，绍文同志终于病倒了。他这一病，大家心里很着急。我和大洪弄到了一个猪肚子，给他营养，但他拿去和监督我们的国民党分子一块吃了，我们很不服气。

秋天，郑绍文同志又从国民党川军中拖过来一些人，温家福也是这时候来的。这一来，我们特工队扩大了，成份也复杂起来了，有些人纪律不好，开始，绍文同志不大处分他们，只是正面教育，后来，经过三令五申，有的人仍然不改，绍文同志就着手整顿。有一次，他通知我，有些黄表、老

酒和一些好吃的东西准备急救。我很奇怪，急救要这些玩意干什么？第二天，他开了一个会，把几个严重违反纪律而又屡教不改的拖出来，一人四十大板，打完了抬到医务所。对于这样的伤，我没治过，束手无策。可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对这伤很在行，把被打的人的裤子一脱，真可怕，屁股都发紫了，伤势较重。他们把黄表往屁股上一贴，拿老酒一喷，就完了。我心想，这不痛吗？过几天，还真地好了。

这期间，我就是这样地学会了不少知识。

一九三九年阴历八月，国民党下令解散特工队，还有消息说要派人缴我们的枪。于是，绍文同志就带我们往南撤。那一夜，我们往前面跑，国民党后面追，部队行进在山谷之间，侦察兵在两边山上搜索前进，走走停停，一夜才走了十七、八里路。第二天再走，就这样，整整三天，一路经过了红门冲、巴家冲、向家冲，到达了八字门。回到了老家，以后，我们就不怕国民党来了。

七、在司令部门诊部

特工队解散，三百多武装编为鄂中区党委的警卫大队，绍文同志接替雍文涛，当了支队政治部主任。他叫我去支队后方医院，我不去，把他下的调令撕了。他拍桌子，要处分我，我哭了一天，还是去支队司令部报了名，杜石公叫我任支队司令部门诊医官，和文工团一起生活。那时候，经费困难，连军装都没有，医生、护士和文工团的女同志全是穿在湖区打差船缴获的阴丹士林布做的衣服。看到这些服装，有的战士还以为我们是群众。一次，一支部队经过这里，看到这么多城市打扮的人，以为是敌人，准备开枪，后来弄清楚了，才未开枪，要是稀里糊涂一打，那就糟了。